

創傷博物館與創傷事件的再現： 以嘉義市「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為例

陳丹怡

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林詩凱

國立中正大學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探討創傷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以及採用何種展示策略來保留集體記憶與再現創傷事件。本研究首先說明博物館應有的功能，並進一步說明創傷博物館所代表的意義。其次，說明創傷事件的形成與影響，以及如何再現創傷事件。接著說明柬埔寨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以及嘉義市「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的展示背景與展示策略。經過以上四個創傷博物館的展示策略分析，可以得知創傷博物館依靠大量的影像及物品，和部分受難場景的重現，使參觀者能夠感同身受，進而理解創傷事件形成的背景、原因與結果。期望創傷博物館能夠再現創傷事件的同時，也能夠將創傷事件傳承下去，保留國家民族的集體記憶。

關鍵字：創傷博物館、創傷事件、展示策略、集體記憶、創傷再現



壹、前言

二二八事件自 1947 年發生至今，已有 72 年的歷史。事件發生後，遭受政府以平定二二八事件為由，在全台灣進行鎮壓與制裁。權威統治以及白色恐怖的社會氛圍大大影響了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屬，以至於迄今仍有許多家屬無法原諒當時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民而言是一個殘酷的創傷。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後隨之而來的鎮壓與戒嚴，深深的傷害著懷著回歸祖國懷抱的台灣百姓的情感。這個傷口在過去幾十年、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沒有人敢開口說出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一直到了解嚴之後，台灣地區進入民主化時代，國民黨不再一黨獨大，民間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檢視與追求真相的呼聲亦隨之高漲。之後歷經李登輝時代乃至於陳水扁時代，二二八事件也從尋回被刻意遺忘的的歷史階段，轉為對歷史的運用、不同歷史闡釋互相競爭的階段（吳乃德，2008）。為了讓後人記取此歷史創傷事件，全台各地的二二八紀念館或文物館陸續成立，配合二二八紀念日舉行相關紀念儀式、進行追悼活動或特展，不斷循環地再現與詮釋創傷記憶。

然而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創傷並非限於事件的當事人而已。此一事件牽連甚廣，影響甚至擴大至社區、社會，所形成的創傷記憶不僅是個人回憶，而是成為集體性的回憶，且在國家民族的形塑與認同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重現創傷事與集體創傷記憶的過程中，博物館可透過現代科技，如影片、錄音檔，或是文本、物件與符號的展示構築創傷事件並再現。在二二八事件中，嘉義一地的反抗是除台北地區之外最激烈的地點，因此本文以嘉義「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為例，探討博物館採用何種展示策略以保留創傷事件及集體記憶。

貳、建構式博物館

在討論博物館與創傷事件的關係之前，首先需要對博物館的建構功能有所認知。博物館除了知識建構的功能之外，還有文化建構的功能。透過這兩種功能，以期博物館能發揮其教育學習與文化傳承的功能。



一、 博物館與知識建構

建構式博物館（The Constructivist Museum）由博物館學者 George E. Hein 提出。Hein（1998：14-40）認為，為了讓觀眾成為主動建構知識者，博物館應塑造一個建構式的學習環境，讓觀眾透過與展示互動，擴充其生活、工作或學習經驗；渠綜合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與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將博物館的教育與學習區分為「教諭式」（Didactic/ Expository）、「刺激反應式」（Stimulus-response）、「發現式」（Discovery），與「建構式」（Constructivism）四大教育理論，如圖 1 所示。茲將四大教育理論介紹如下：

1. 「教諭式」教學指知識是客觀存在，學習者在教學者講授告知的狀況下，被動接受知識；
2. 「刺激反應式」教學中，透過教學者給予的刺激，學習者雖處於被動狀態，仍可以連結知識，累積個人經驗；
3. 「發現式」教學，透過探索策略，學習者主動發現存在於個人之外的知識；
4. 「建構式」教學，透過教學者與學習互動，轉化彼此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換言之，若以學習者態度分類，則「教諭式」與「刺激反應式」教學的學習者被動接收知識；而「發現式」與「建構式」教學的學習者主動學習知識。若以知識的來源分類，則「教諭式」與「發現式」教學中的知識存在於學習者之外；「刺激反應式」與「建構式」教學中的知識由學習者個人或社會建構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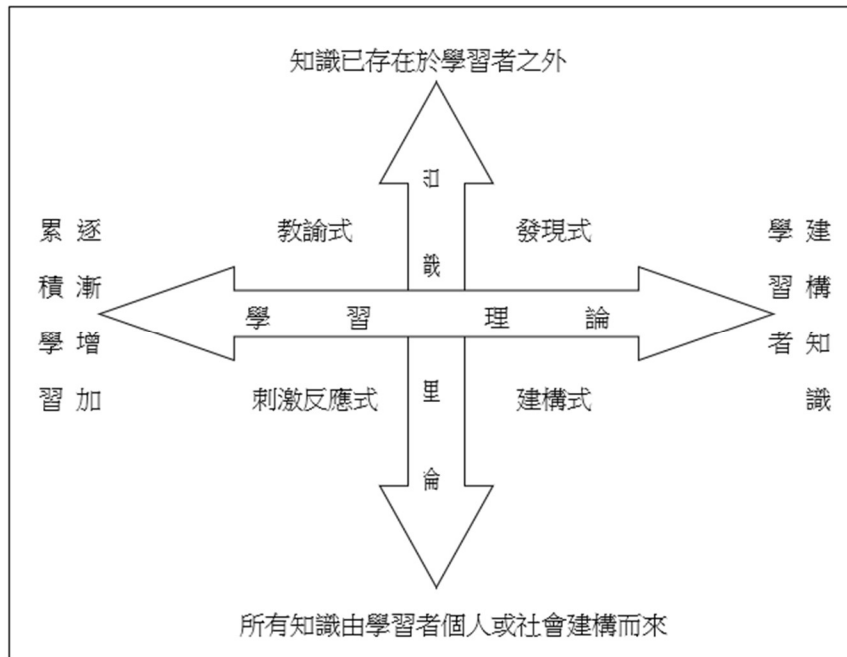


圖 1 Hein, G. E. 四大教育理論圖¹

¹ Hein, G. E., Learning in the Museu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Loomis, 2008). p.25.



基於 George E. Hein 的建構主義原則，博物館應提供給參觀者（學習者）可思考且可觸摸的學習情境，幫助參觀者成為主動的學習者，學習組織原理原則的能力，瞭解如何學習才是有效的學習。此外，博物館在展示設計與教育活動的規劃中，需要借用建構主義的原則，形成對話平台，引發觀眾與他人的互動，產生討論與經驗分享，形成集體學習，產生知認知轉化。

二、 博物館與文化建構

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博物館或展示所鑲嵌的意義，除了符應參觀者先備知識，如個人興趣、認知和理解等因素外，如何形塑族群之歷史文化，傳遞政治社會經驗等，益受到重視。博物館與當下之政局與社會現象之連結與對話，包括族群、移民之文化肯認，以及弱勢族群政治權利倡議等（陳雪雲，2010）。其中，博物館與人類苦痛和人權倡議是重要的一支，如同 Deffy（2001）認為這些與人類苦痛相關之博物館遍布世界各地，諸如屠殺博物館有和平紀念館、奴隸博物館、人權博物館、監獄博物館等。

博物館作為歷史記憶保存機構，透過重大意義或特殊涵意的物件選擇與展示再現，有意識地建構集體記憶，或書寫族群與國家的歷史，以形塑民眾成為想像共同體之一員。其中，紀錄國家民族過去所共同經歷創傷之紀念型博物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陳佳利，2007a：61）。

在歷史文化形塑過程中，博物館實踐正轉移。例如，論述博物館定位時，Casey（2003）認為，博物館從物件中心的「立法博物館」（legislating museum）轉向以觀眾為中心之「詮釋博物館」（interpreting museum）和「展演博物館」（performing museum）。再者，許多學者如 Hooper-Greenhill（2000）、張譽騰（2000）、許功明（2003）、陳雪雲（2005）、劉琬珍（2005）等論述博物館專業營運，在定位角色和策展時，強調應採詮釋批判取向，為觀眾提供知識分享平台，以提升文化和族群認同。因此，博物館如何與觀眾產生互動成為策展者和導覽者的重責大任。爰此，本研究引巴西教育學家 Carbone（2003）的觀點歸納出，博物館應扮演催化者角色，以及在知識和文化轉譯過程，應充滿愛心、展現信任、謙卑，致力於與連結事件相關對象，試圖引領對話、創造希望與帶動意識覺醒。



參、創傷事件與記憶建構

從個人角度而言，創傷（trauma）泛指個體遭受精神或身體上的傷害（張春興，2007）。創傷指向深層的受傷，牽涉到禁忌的事件或認知，造成不確定、不明白的恐懼，以及不解的癥結，成為深深的壓抑（阮秀莉，2002）。從精神分析觀點而言，創傷依發生時間的先後可區分為「體驗—詮釋—重複」，亦即是個人在創傷的第一時間無法掌握並主導事件；接著個人將創傷事件重新編碼，並加以詮釋與建構，形成創傷的第二個時間；最後，為緩和創傷事件所帶來的焦慮，解除對事件的不確定，需要不斷地討論與詮釋事件，重複理解創傷，形成第三個時間（沈志中，2004）。由此可知，創傷對於個人的影響不在於身體上的傷害，而是在於對創傷事件的發生，沒有事前心理準備，以及對於創傷事件因無法掌握與改變所產生的無力感。

一、文化創傷的定義

除個人創傷外，近年來社會重大事件，如戰爭、災難帶來的個人或集體生命經驗轉變，也逐漸受到重視，此現象讓 Alexander（2004）提出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概念來解釋之。況且，文化創傷的發生源自於一個群體中的成員，共同遭遇某些可怕的事件，致使渠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並烙印在其族群意識之中，使創傷經驗永遠留在回憶裡。足以證明創傷不是人類對於苦難事件的心理反應，而是來自於文化的集體意義的結構被破壞，形塑出整體社會文化的傷害並非心理創傷而是文化創傷。

總的來說，遭受創傷的群體，若將其遭遇的創傷事件重新整理，並加以詮釋、述說、傳播，形成一個集體的記憶、集體的苦難，可被稱為文化創傷。以台灣為例，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民眾影響深遠，加上國民黨隨後展開清鄉、戒嚴與白色恐怖，造成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恐怖記憶不敢說也不能說，只能壓抑在內心深處，成為說不出口的文化創傷。

二、文化創傷的再現

遭受文化創傷的團體若要將自身經歷過的創傷再現，必須透過語言符號與當事者協同合作，先將事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特徵加以深度理解與詮釋描述，並運用平面或影像媒體傳播出去，這種特徵描述就是「再現」。Alexander（2003、2004）認為，這種以社會團體的身分將這些歷史記憶再現及散播，可視為這些團體對社會現實形成成因及暗示責任所做的宣稱（claims）。即社會團體從自己所遭受的傷害，價值觀被改變開始敘說，到創傷事件遭遇，最後宣告要求情感上、實質上與象徵上的補償與重建。這樣的宣稱開啟文化創傷的建構。



事實上，文化創傷的重建，應考量三個要素：講述者、閱聽人與情境（Alexander, 2003: 155）。講述者為提出宣稱的團體，閱聽人是民眾，情境則是創傷事件出現的背景。他們採用具有說服力的方式，利用歷史情境、文化資源與制度結構，把對創傷所做的宣稱投射到民眾的身上。

這樣重建文化創傷的過程如同說一個新的故事，這是一種複雜且具有多種象徵意義的過程。Alexander（2003: 156-158）認為，創造新的敘事，必須包含以下關鍵要素，才能成功地再現過程。它們分別為：

1. 傷痛的本質：發生了什麼事，使什麼人受害？
2. 被害人的本質：哪些人是受害者？是特定的個人或團體，還是非特定的對象？此種傷痛帶來衝擊的是範圍有限的，還是廣泛的？
3. 受創傷者與廣大閱聽人的關係：沒有受害的旁觀者，有無認同或能否認同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難？
4. 責任歸屬問題：誰是加害人？誰要為這些苦難負責？

以二二八事件為例，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若要重現他們的文化創傷，可以依據上述四點，歸納並整理自己的創傷經驗，藉此展示自己的文化創傷，引起社會大眾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理解。為了重現文化創傷，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可以透過出版書籍、在博物館內擔任導覽員親自解說當時發生的事件，或是參與創傷情境的重建等方式再現二二八事件。

三、 從記憶恢復到保存紀念

（一）、 創傷記憶與博物館

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對博物館的定義為：「凡為服務社會及促進社會發展，從事蒐集、維護、研究、傳播、展覽與人類暨其生活環境有關之具體證物，且以研究、教育、提昇文化為目的而開放之非營利的法人機構皆屬之。」換言之，博物館是非營利機構，其功能有蒐集物件、保存資料、展示文物、教育學習等。對於有意重建文化創傷的團體而言，博物館是再現創傷最佳的場域，更重要的是自身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創傷獲得認同。

但是博物館提供創傷經歷的三個時間與一般的創傷事件的歷程有所不同。就體驗的時間而言，博物館提供的並非第一時間、當事人當下的體驗，而是透過蒐集物件與空間設計後重建創傷事件。透過展示與模擬空間，讓參觀者產生想像與移情作用。至於詮釋的時間，需要博物館透過理解與詮釋，讓參觀者接收訊息並加以理解。在重複的時間裡，博物館配合社會背景與脈絡，將有爭議的觀點與詮釋透過不斷的重複討論與詮釋後，成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意義（陳佳利, 2007b: 52）。

保存創傷記憶等災難事件的博物館大致可分為兩類，就災難事件的性質而言，可分為天災與人禍（陳佳利, 2007b: 61）。前者由天然災害造成，主要以地震博



物館為主，例如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紀念 1999 年在台灣發生的集集大地震。另有水災博物館，位於美國賓州的約翰斯敦水災博物館（Johnstown Flood Museum），紀念 1889 年造成居民死傷慘重的水災，也屬於天災型博物館。後者以戰爭紀念博物館為主，尤其是與二次世界大戰相關的博物館，例如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等。此外還有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裡面展示越戰期間美軍與越軍所使用的武器，以及相關照片、物件等。

天災類的創傷博物館帶有明顯的教育目的，例如地震博物館會教導地震相關的知識以及避難的方法；而人禍類的戰爭博物館則因為戰爭雙方、博物館參觀者的政治立場、社會背景以及利益關係的不同，對於戰爭事件形成不同的理解與解讀。例如越南的戰爭博物館為了彰顯美軍在越戰中造成越南重大傷亡，因而命名為美國戰爭罪惡館。後因越南與美國重新恢復邦交，越南為了對美國表示友好，將美國戰爭罪惡館改名為戰爭遺跡博物館。從越南戰爭遺跡博物館的改名過程可以看出戰爭類的博物館會因交戰雙方的關係，改變其原本的立場與觀點。

（二）、 集體記憶與紀念物

從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到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再到美國的越南退伍軍人紀念碑，這些由國家或民族建立的紀念建築部分地代表這些民眾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他們用這些紀念建築反映或傳承他們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又稱集體回憶，由 Maurice Halbwachs（1980）所提出。他認為集體回憶是一個群體裡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建構的概念，是一種凝聚的策略，用來增加群眾對於某群體、社會、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由於集體記憶有凝聚、認同的特色，因此集體記憶除了存在於民眾的腦海中，也可以化為具體的象徵，例如文字描述，包含論述、報章雜誌、日記、影像記錄等；以及聚落、建築物，例如紀念碑、紀念雕像博物館等；另一種為參與式的無形資產，包括參與紀念日的活動與紀念慶典、儀式等。

這些紀念物或無形慶典儀式的存在可以吸引民眾參觀，進而理解詮釋創傷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而紀念碑的矗立，可以把個人的記憶轉化為共同的歷史，再進入紀念的階段。換言之，在一個創傷事件的復原過程中，紀念碑的興建是為了達成療傷、原諒、警惕等目的，並呈現事件欲表達的紀念意義。事件的受難者因為紀念碑的興建，讓民眾理解並回想此種創傷事件帶來的影響，提供了詮釋的機會。

創傷事件如何從記憶轉變為紀念？首先在事件發生後，透過協同對話方式，如口述歷史、影像記錄，以蒐集個人記憶，例如加害者、受難者、關懷者等的個人記憶，並將之匯集成為集體記憶。成為集體記憶之後，經過轉化的過程，無論是物件、展示或慶典儀式，成為文化保存的一部份，再成為社會大眾共享的歷史。



以二二八事件為例，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採取高壓統治，許多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與家屬不敢說，也不能訴說自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死去的受難者在家屬的生命中缺席，受難者家屬需要一種能夠填補受難者消失的象徵，因此興建二二八相關的紀念館與紀念碑便可符合受難者家屬的期待。興建二二八紀念碑可以把受難者、受難者家屬、關懷者與加害人等不同群體之記憶加以融合，從個人記憶轉化為集體記憶，再成為文化保存的部分，最後變成社會大眾共享的歷史，形成公共記憶（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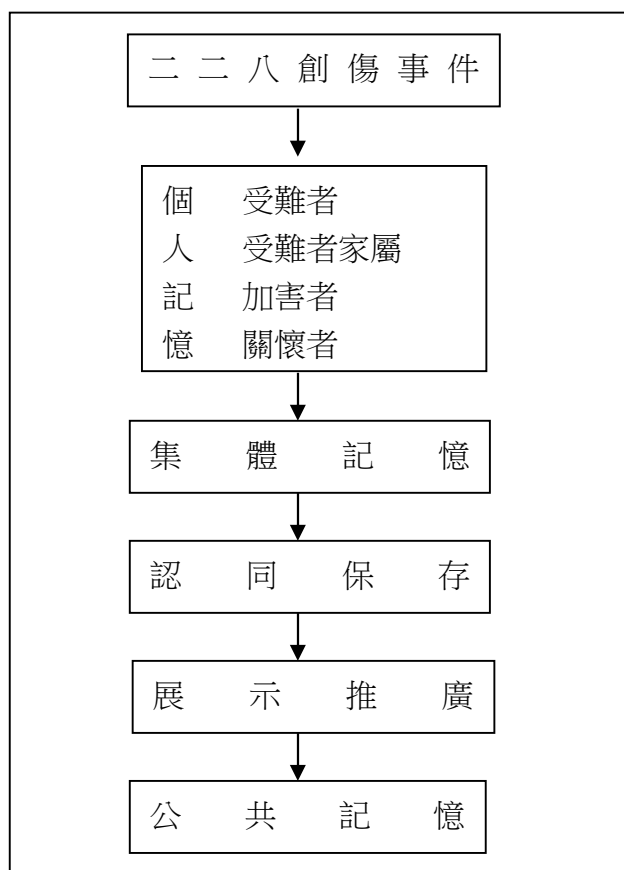


圖2 創傷事件轉化為公共記憶的過程圖²

² 研究者自行繪製



肆、創傷博物館展示與解說策略

一、創傷博物館的展示

博物館展示是指博物館中物件的陳列、擺設或展覽。在博物館中，任何一件物品的展示都是有意義的陳列，其目的在於與參觀者進行溝通，以達成各種不同的目標。

然而，創傷博物館的性質不同於一般博物館，它的展示在於保存創傷事件的記憶，透過博物館內展示物件的展示物件重現創傷事件，提供一個公共場域讓人們對此創傷事件加以理解與詮釋。因此，創傷博物館的展示策略不同於一般博物館。

若以紀念人禍類的戰爭博物館為例，為了突顯戰爭的慘烈，多採用描述的方式，以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作為展示的主軸，並搭配大量照片與影像，尤其是報章的攝影加以佐證；另外運用與事件相關，或與戰爭有關的文物加深觀眾的印象（陳佳利，2007c：46）。

總之，紀念戰爭的創傷博物館，其展示策略在於採用大量的照片和影像，並配合戰爭當時所使用的物品，例如武器；或是仿造當時的環境，例如監獄等，重塑當時的歷史背景與環境，使參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受，並能引發哀悼、反省或記取歷史教訓的意義。

二、創傷博物館的個案介紹

以下介紹三個創傷博物館，分別是柬埔寨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USHMM）、以及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War Remnants Museum）。其中吐斯廉屠殺博物館整理自呂理政（1999）、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整理自 J. K. Ochsner（1995），至於戰爭遺跡博物館則是整理自博物館提供之解說摺頁與研究者本身之觀察和心得，試圖以這三個個案說明創傷博物館的實際展示策略。

（一）、柬埔寨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

1. 背景介紹

1975 至 1979 年間，波布（Pol Pot）兄弟統治柬埔寨，在任內展開大屠殺。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由一所中學改建而成，在共產黨波布政權執政時被改為拷問、行刑、監禁死囚並執行的場所。此處曾有近一萬五千名囚犯被凌虐致死。在波布執政的三年八個月中屠殺的對象除政治犯外，也包括一般平民百姓。



2. 展示策略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共分為 ABCDE 五個部分，皆為當時囚禁人犯的監獄。博物館保留建築物的外觀與牢房結構。從監獄外觀可以看出一樓走廊雖呈現開放狀態，但出入口皆有鐵絲網限制囚犯進出（見圖 3）。



圖 3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監獄走廊外觀³

博物館樓上原為學校的走廊，為了防止犯人逃離，走廊以鐵絲網封閉，僅有兩端有出入口（圖 4），目的在於控制犯人的出入。



圖 4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監獄走廊外觀⁴

3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2020). <https://tuolsleng.gov.kh/en/museum/>

4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2020). <https://tuolsleng.gov.kh/en/museum/>

監獄內部為學校教室，在大屠殺期間將教室改為狹窄的牢房與拷問所(圖5)。以狹窄的牢房控制犯人的活動空間，營造壓迫感，屬於精神方面的折磨。



圖5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牢房⁵

牢房內部的擺設也保留下來供遊客想像被監禁的生活。牢房只有簡單的鐵架床鋪，簡陋的設備可想見被囚禁的生活困苦。房間雖有窗戶，但仍加裝鐵窗，防止犯人逃跑(圖6)。



圖6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牢房內部擺設⁶

⁵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2020). <https://tuolsleng.gov.kh/en/museum/>

⁶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2020). <https://tuolsleng.gov.kh/en/museum/>



博物館其他空間與部分牢房展示大量的受難者照片，照片顯示有如此多數的受難者在大屠殺中喪命，這些受難者只剩照片供後人憑弔（圖7）。



圖7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罹難者照片⁷

此外博物館還保留當時的刑具以及各種描繪殘酷刑求的油畫（圖8）。從油畫中瘦骨嶙峋的犯人體態可以得知當年被被囚禁時所遭遇的非人待遇。



圖8 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牢房與油畫展覽⁸

博物館還展出由受難者的骨骸排列而成的柬埔寨地圖、許多犯人所用的腳鐐與衣物，全都展現在參觀者的眼前。博物館外的庭院中則有數個墳墓，以表示對受害者的尊重。

⁷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2020). <https://tuolsleng.gov.kh/en/museum/>

⁸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2020). <https://tuolsleng.gov.kh/en/museum/>



綜上可知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的展示策略以保留的原址為主，保留下來的監獄外觀與內部再搭配大量的照片資料能讓參觀者直接體驗大屠殺的殘酷，產生感同身受的想法。此外還以藝術的方式，用油畫呈現囚犯被刑求、拷問的過程，避免太過寫實造成參觀者的不舒服。

(二)、 美國的大屠殺紀念博物館

1. 背景介紹

美國的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於 1993 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揭幕。此座紀念館成立的目的是在於紀念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

2. 展示策略

美國的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所採用的展示策略分為三種：

(1) 個人生命故事卡

進入館內參觀時，在入口處拿到一張個人生命故事卡。卡片上的資料是一位與參觀者基本資料相似的猶太受難者，上面記載著他的照片、生平與遇難事蹟。參觀者可以憑這張卡片在紀念館中體驗這位受難者遭受迫害、死亡的過程（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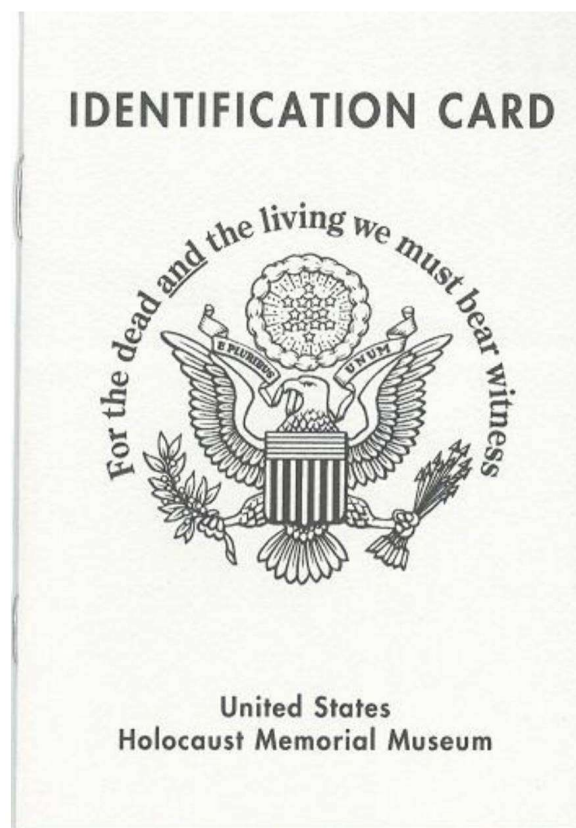


圖 9 個人生命故事卡⁹

⁹ 王信惠，《美國人權相關博物館及文化設施考察報告》（2017），頁 17。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600120>



(2) 容顏之塔 (Tower of Faces)

容顏之塔由大量的照片堆疊而成，這些照片的數量超過 1000 張。由於容顏之塔採挑高設計，一般參觀者無法窺探全貌，因此具有集體匿名的性質。此外，有別於個人生命故事卡可瞭解某一猶太人的生命故事，容顏之塔代表的是缺乏個人特殊生命經驗。但是容顏之塔高聳的設計所營造出來的氛圍確實給予參觀者由上而下、沈重的壓力（見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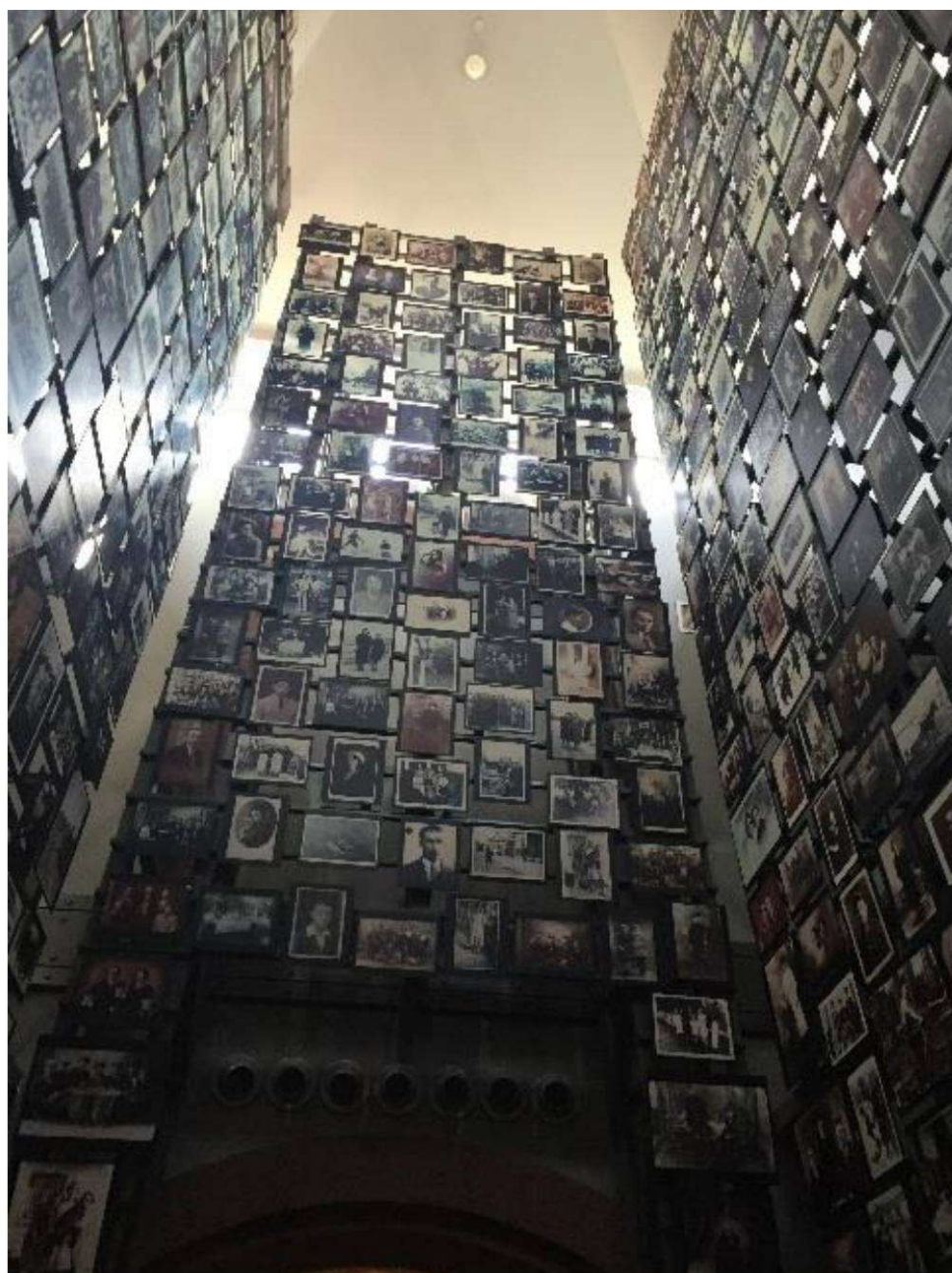


圖 10 容顏之塔¹⁰

¹⁰ 王信惠，《美國人權相關博物館及文化設施考察報告》（2017），頁 25。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600120>



(3) 死亡營 (death camps)

死亡營採用劇場式的展示，參觀者觀看死亡營的展示時，會被壓倒性的恐懼佔據，甚至聽到死亡營倖存者透過錄音訴說他們的回憶，藉由見證者的聲音與回應，再現死亡營的場景。

除容顏之塔外，紀念館中還展出數量龐大的受難者使用過的鞋子（圖 11）、剪刀、刷子、梳子以及牙刷等等，形成一股強大的震撼力。



圖 11 猶太受難者遺留下來的鞋子¹¹

展場中以大量的照片展示大屠殺的歷史事件。此外，紀念館亦重構部分集中營的建築物，如牢房，或是搭乘的交通工具，如運送猶太人的火車車廂（圖 12）等，讓參觀者藉由部分想像建構全體。



圖 12 運送猶太人的火車車廂¹²

¹¹ 王信惠，《美國人權相關博物館及文化設施考察報告》（2017），頁 28。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600120>

¹² 王信惠，《美國人權相關博物館及文化設施考察報告》（2017），頁 27。

美國的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大量蒐集與大屠殺相關的資料、照片、文件、影片、口述歷史與檔案，除了保存受難者的記憶之外，亦希望參觀者能夠藉此反省。館中以大量的黑白照片（圖 13）塑造肅穆的氣氛，透過各種文物與參觀者產生連結，促使參觀者反思與檢討，避免重蹈覆轍。



圖 13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館內展示¹³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600120>

¹³ 王信惠，《美國人權相關博物館及文化設施考察報告》（2017），頁 18、19、21、23。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0600120>

(三)、 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

1. 背景介紹

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又稱為戰爭證跡博物館，位於越南的胡志明市。越南文為 Bảo tàng chứng tích chiến tranh，英文名稱為 War Remnants Museum，是一個展示越戰所遺留之物品與照片的博物館。1975 年 4 月 30 日越戰結束，越南政府即在同年 9 月 4 日於美國的大使館原址成立該博物館。最初定名為 The House for Displaying War Crimes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the Puppet Government (of South Vietnam)，意味美國帝國主義戰犯暨（南越）傀儡政府展示館。中間再次更名為美國戰爭罪惡館（Museum of American War Crimes），後因美國與越南於 1995 年重新建立邦交關係，才將博物館改名為戰爭遺跡博物館，並沿用至今。

2. 展示策略

博物館主要以圖片展示為主，包含八個主要展覽廳，並分佈在不同的區域。其中七個在室內，一個在室外。室外的展示區陳列越戰時期美國遺留的各式武器，如直升機（圖 14）、戰機、炸彈、坦克（圖 15）、攻擊機、步兵用的火砲，以及清理現場用的推土機等，每一種武器前方均有展示牌簡短說明該武器的用途。



圖 14 美軍遺留的直升機¹⁴

¹⁴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collection-aircraft>





圖 15 美軍遺留的坦克車¹⁵

室內的展覽廳根據它的實體展出內容分為七個廳，第一個廳是博物館的主館，一進門便可看到胡志明像，以及有關獨立宣言的部分內容及相片。該廳的主題是外國勢力在越南，有系統地展出歷史事實的部分，包括各國敵對勢力發動越戰的過程與陰謀（圖 16）。



圖 16 越南戰爭遺跡博物館展示區¹⁶

¹⁵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collection-tanks>

¹⁶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on-historical-facts>



第二個廳是外國記者的歷史紀錄，主要展示戰地記者所拍攝的照片。有 11 個不同國籍，大約 134 位戰地記者所拍攝的記錄圖片即在此展出，藉以悼念在越戰中的人事物。這些戰地攝影記者的圖片與故事按照時間順序被放置在博物館最重要的位置，更有多幅榮獲普立茲獎殊榮的作品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例如遭受空襲後揹著多個孩子游泳逃難的母親、被汽油彈燒傷之後在公路奔跑的女孩、越南軍人槍斃越共士兵等等。這些照片在越戰後期影響了美國民眾，並激起反戰意識，促成越戰早日結束（圖 17）。



圖 17 外國記者攝影集¹⁷

¹⁷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on-islamic-concept-collection-of-the-us-war-of-aggression-in-vietnam>



第三個廳以戰爭的後果與遺跡為主，該館又被稱為人權館，陳列了許多美軍殺害越南人的照片，有些照片理的美軍提著越共的頭顱，也有些照片展示當時所使用的武器，包括用幾十根鐵釘製造而成的鐵釘炸彈、內裝數百顆鐵珠的鐵珠炸彈、凝固汽油彈、化學武器等。每一種武器的殺傷力皆非常驚人，可以想見當時戰況的慘烈。大廳的中央豎立一座由砲彈碎片製作而成的雕像，名為母親（Mother），象徵希望。一旁展示美軍在越戰期間所使用的化學藥劑以及造成的後果。故可看到美軍所使用的落葉劑，不僅造成美軍本身受害，也令越南人民出現罹癌的病例、甚至有因為落葉劑而造成的畸形兒（圖 18）。



圖 18 因落葉劑副作用造成的連體雙胞胎的照片¹⁸

¹⁸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victims-of-agent-orange>



第四個廳為戰爭中的監獄，具體陳列越戰時期的監獄制度，包括典型的監牢、集中營或是各種拷問、折磨、摧殘政治犯生理與心理的惡毒手段。其中有一座法國殖民政府時期使用的斷頭台，與一般斷頭台不同，此座斷頭台採仰躺方式進行處決，意圖讓犯人的身心受到最殘酷的折磨。斷頭臺台上留有許多黑色污垢，這些污垢是當年被處決的犯人所留下的血跡（圖 19）。另外還設有虎籠一座。所謂虎籠，是專門關押政治犯用的監牢，上方沒有屋頂遮蔽，讓犯人日夜接受日曬雨淋。監獄的看守人員不時會從上方灑下石灰，侵蝕犯人的皮膚。

圖 19 斷頭台¹⁹



¹⁹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guillotine>

第五個廳則是兩位日本記者 Ishikawa Bunyo 和 Nakamura Goro 在越南拍攝的「戰爭與和平」記錄圖片集。

第六個廳是各國人士支持越南人民抗戰事業，也是越南的外交發展史。

第七個也是最後一個廳，主題是戰爭與和平，展出色彩豐富的兒童繪畫。以一幅名為和平鴿的大型畫作為主，附有中英越三種文字解說，一旁配有世界各國的兒童繪畫做陪襯，與前幾個廳的黑白、血腥照片成反比，期許和平降臨在世界上（圖 20）。



圖 20 戰爭遺跡博物館的兒童繪畫²⁰

越南戰爭遺跡博物館採用的展示策略亦以歷史事件的時間軸為主，採用大量的照片與報章雜誌的報導凸顯戰爭的慘烈，其中有多幅攝影記者的作品獲得普立茲獎的肯定，更可以加深參觀者的對越戰的印象，引發其哀悼、反省及反思的效果。特別是越南戰爭遺跡博物館最後一個展示區展出小孩天真與充滿光明的畫作，與前幾個展示區的展品形成強烈對比，亦可引起參觀者記取歷史教訓的意義。

²⁰ War Remnants Museum (2020). <http://warremnantsmuseum.com/article/childrens-painting-entitled-war-and-peace>



伍、「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展示策略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共有三個執行單位，分別為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嘉義市二二八事件研究協會以及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前兩者主要宗旨為彌合二二八事件歷史傷口，撫慰受難者及家屬，並促進社會和諧，後者則是由陳澄波子女為繼承父志，提升台灣藝術發展而進軍世界畫壇為目標而設立。陳澄波為嘉義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其子陳重光擔任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並表示當初成立該文化館時，原本只為展示二二八相關照片與物品供後人參觀，但怕文化館只展出二二八相關物品會讓展品不夠豐富，故再加上父親陳澄波先生的生平事蹟與複製畫作，以期為文化館帶來多元的氣息。

一、背景介紹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位於嘉義市中正商圈內，面對中正公園，室內面積 185 平方公尺，其中一半規劃成陳澄波先生複製畫展覽廳，暨展出嘉義市二二八大事紀，嘉義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生平事蹟及有關二二八事件之中外史料書籍、二二八事件相關資料比對展及陳澄波先生相關史料、各類美術書籍等。另一半則規劃社區學術及會議中心、教學中心、志工解說員培訓場所、圖書館及辦公室等。若有大型活動則尚有嘉義市二二八紀念公園暨紀念館可供運用。

一樓設有接待櫃檯，大廳展示陳澄波的畫作，以及嘉義市參觀二二八事件相關史蹟的參觀路線圖。大廳右側有三個小房間，分為 A、B、C 三室，內有嘉義市二二八影像展、二二八紀念文物與二二八歷史、藝術等相關叢書的展示。A 室展出驛前英靈影像展以及血洗劉厝庄；B 室展出隕落的鳳凰花、高一生影像展以及部分血染的諸羅山城影像。C 室則以血染的諸羅山城與嘉雲平野二二八為主（見圖 21）。

二樓有一會議室，以及董事長辦公室，另有陳澄波的複製畫作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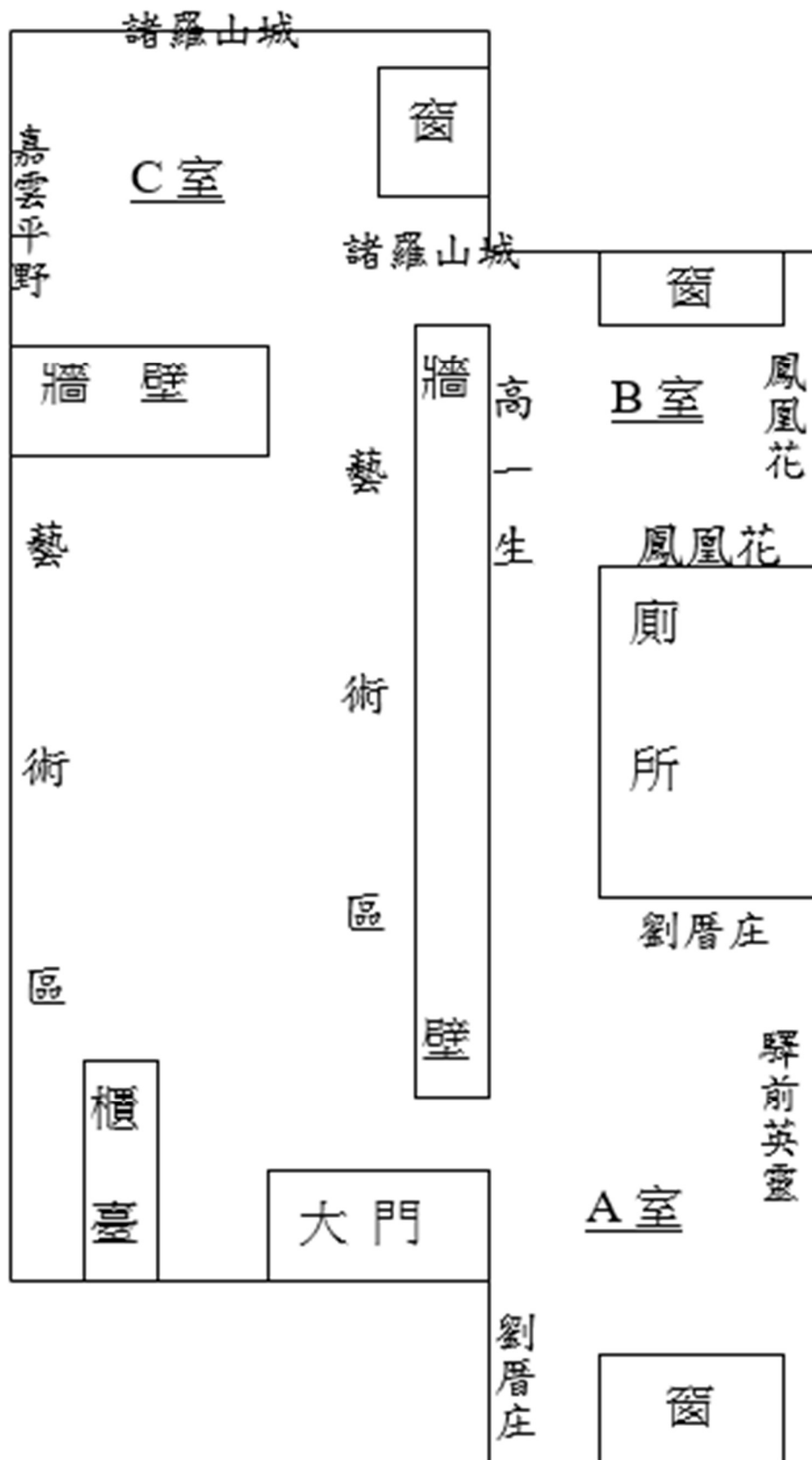


圖 21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展覽品位置圖²¹

²¹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展覽品位置圖，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 展示策略

根據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2005）所提供之資料，「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所展出的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共分為六部分。第一部份為驛前英靈影像展。這裡展出在嘉義市火車站前分三批被槍決示眾的陳澄波等 16 人所遺留下來的照片。此處展出受難者盧鈞欽的遺書與被彈孔射穿又沾滿血跡的衣物，藉由受難者遺留下來的物品訴說受難的歷史。還有陳澄波生前的相片，以及在火車站遭槍決後，遺體運回家後的照片，黑白照片中陳澄波雙眼未閉躺在門板上，確實給予參觀者強烈的震撼效果（圖 22）。



圖 22 驛前英靈影像展²²

²²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二二八事件展示品。研究者自行拍攝

第二部分為血洗劉厝庄，此事件發生在水上機場附近一個名為劉厝庄（現為劉厝里）的小村落，該村落的居民多以務農為主。因二二八事件蔓延至嘉義時，前往水上機場圍攻的嘉義市民借道劉厝庄，以致於退據機場的國軍誤以為劉厝庄為窩藏反抗民眾的大本營。此處最為特別的是二二八事件當事人陳水蓮指著自己中槍處的照片。有別於文化館中所展出的影像多為罹難者生前的照片，陳水蓮以事件當事人的身分親自現身說法，令參觀者心中感觸更深（圖 23）。



圖 23 血洗劉厝庄影像展²³

由於劉厝庄為一農村，大部分村民並沒有留下照片，只有邱垂榮有留下遺照。因此在這一部份的影像展以劉厝庄當地遭受屠殺事件的發生背景為主，除了有劉厝庄與水上機場的相關地理位置圖、嘉義地區二二八事件發生及關係位置圖之外，還有生還者陳水蓮與受難者家屬解釋劉厝里發生在何地發生何事的解說照片，以及一些死難者家屬述說心情的照片。

²³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二二八事件展示品。研究者自行拍攝



第三部分為隕落的鳳凰花，這裡描述的是二二八事件中，為了保衛家鄉而犧牲的嘉義市年輕人，內容再分為三部分。首先是南靖糖廠慘案，糖廠員工護送外省人前往嘉義市區接受保護，被誤認為台灣人抓走主管，因此四位糖廠員工被埋伏的軍隊殺害（圖 24）。



圖 24 隕落的鳳凰花影像展²⁴

其次是陳慶元家的悲劇。陳慶元家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了三個兒子，陳慶元也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被以「提供學校讓支援攻打機場的原住民居住」為由抓走，關了四個多月之後才放回。最後是林清柱、陳少輝與江振猷三人在水上機場的事蹟。這個部分也是以照片的展覽為主。

第四部分為高一生影像展。這個部分的展示，將高一生的生命分為學生時代、家庭生活、建設鄉野、二二八事件、慘遭整肅以及後記等，採用影像展並搭配簡略的文字加以敘述。

第五部分為血染的諸羅山城，這裡展示的影像多為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遭受池魚之殃的無辜民眾。共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無辜受害的民眾，接著是慘遭報復的菁英，最後是凋零的熱血青年。

第六部分為嘉雲平野二二八，由於日治時代的地方制度規劃，嘉義、雲林同屬於台南州的管轄區域，彼此之間來往關係密切，因此當嘉義市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也牽動雲林縣緊張情勢。本區的展覽即以攻打虎尾機場、坎腳厝遇襲以及樟湖抵抗三個重要事件為主軸，逐一介紹嘉義雲林地區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所發生的反抗事蹟。

²⁴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二二八事件展示品。研究者自行拍攝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設立之初便決定雙軌展出二二八事件相關文物以及陳澄波的生平畫作，因此展場的另一邊設有陳澄波的畫作展覽與生平介紹（圖25）。藉由畫家陳澄波與二二八事件連結，提醒參觀者莫忘二二八事件造成多少台灣本土菁英的流失，亦希望參觀者能記取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訓，不要因為省籍問題再次產生悲劇。



圖 25 陳澄波複製畫作展示區²⁵

²⁵ 「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陳澄波複製畫作展示區，研究者自行拍攝



陸、結論

綜合柬埔寨的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越南的戰爭遺跡博物館以及嘉義市「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等四館的展示背景與策略，可以歸納出以下特色：

1. 展出大量受難者的物件與影像

以上四間博物館的展出場域必有一部份是大量的照片與影像展，尤其是受難者的照片，包含生前的相片以及受難當時的照片、甚至是受難後的照片。藉由照片訊息上的人事時地物強化創傷事件的存在感與可信度，見證該創傷事件造成的死傷慘烈，加深參觀者的印象。

其次，受難者遺留的物件傳遞特定訊息，讓參觀者透過想像將受難者的形象與展示物連結起來，揣摩出受難者面臨的情境，進而建構出創傷事件。因此受難者的遺留物件有其特殊意義存在，可視為創傷事件的具體見證。

2. 重建受難場景

受難場景的重新建構可以讓參觀者有身歷其境的效果。利用部分代替全體，參觀者依照獲取的資訊，藉由自己的想像補足整體，再次建構創傷事件的歷史場景（陳佳利，2007a 改為 b）。讓參觀者在參觀時能夠增加臨場感與真實感，進而產生同理的感受。

創傷博物館作為展示的機構，一方面可以借由展品與創傷事件的連結，扮演促進道德社群形成的機制，另一方面又可連結創傷事件與民眾的集體記憶，成為凝聚生命的場域。此類博物館期望能夠藉由各種展示品將創傷事件傳承下去，並期望參觀者能夠從博物館提供的敘事及參觀經驗中，感懷歷史悲劇的發生以及其造成的傷害，進而反思檢討，冀望人類能夠記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錯誤。



參考書目

- 吳乃德, (2008)。〈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月刊》,第8期,頁41-42。
- 呂理政 (1999)。《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台北:南天)。
- 沈志中 (2004)。〈解構事件與 911 創傷〉,《當代》,第207期,頁42-55。
- 阮秀莉 (2002)。〈大地的變貌·自然的銘刻:論述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景觀〉,《中外文學》,第30卷,第9期,頁118-150
- 張春興 (2007)。《張氏心理學辭典重訂版》,(台北:東華)。
- 張譽騰 (2000)。《當代博物館探索》,(台北市:南天)。
- 許功明 (2003)。〈台灣原住民藝術:當代與原始的對話〉,《現代美術學報》,第1期,頁103-127。
- 陳佳利 (2007a)。〈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6期,頁105-143。
- 陳佳利 (2007b)。《被展示的傷口: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筆記》,(台北:典藏藝術)。
- 陳佳利 (2007c)。〈生命中不可再現之痛:論戰爭紀念博物館之展示與敘事策略〉,《博物館學季刊》,第21卷,第1期,頁45-58。
- 陳雪雲 (2005)。〈台灣博物館觀眾研究回顧與展望〉。載於王嵩山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頁115-140,(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陳雪雲 (2010)。〈全球化境況下博物館的新視野〉,《博物館簡訊》,第51期,頁6-10。
- 劉琬珍 (2005)。〈透視博物館劇場:博物館知識建構的真實世界〉。載於王嵩山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頁189-200,(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Alexander, J. C. (2003).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J. C. et al. (2004).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bone, S. (2003). 'The dialogic museum and ethnocultural diversity.'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Vol. XXXVII (1), pp.127-136.
- Casey, V. (2003). 'The museum effect: Gazing from object to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history museum.' In: Les institutions culturelles et le numérique. Paris: Ecole du Louvre.
- Deffy, T. M. (2001). 'Museums of 'human right 'and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Museum International, Vol. 53(1), pp.10-16.
- Hein, G. E. (1998). "Learning in the Museu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Loomis.



- Hooper-Greenhill, E. (2000). "Museu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urice, H.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Ochsner, J. K. (1995). 'Understanding the Holocaust through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Vol. 48(4), pp.240-249.



Trauma Museu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tic Events—The Study of Chiayi 228 Museum

Chen, Tan-I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n, Shih-Kai

Assistant Researcher, Center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the trauma museums and what display strategies are used to preserve collective memory and represent traumatic event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a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museum should do and the further meaning of the trauma museum. Second, explain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 of traumatic events and how trauma museums represent traumatic events. Then analyze display strategies of Tuol Sleng Museum,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War Remnants Museum, and Chiayi 228 Museu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isplay strategies of the above four trauma museums, we can know that trauma museums rely on a large number of images and objects, and the reappearance of some of the suffering scenes, which can make visitors feel the same and the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causes and results of the traumatic event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trauma museums can represent the traumatic events, pass on the traumatic events and preserv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national nation.

Keywords: trauma museum, traumatic events, display strategies, collective memory, trauma representation

